

七、萬里寄蹤長是客

——蕭公權教授訪談記

「落葉辭枝心未死，宛轉飄風，捲入滄溟裏，一任驚波朝暮洗，霜痕不減殷紅淚。」

天末長風何日起，倒海迴瀾，送到歸根地，便化塵沙都不悔，勝隨斷梗沈波底。」

——蝶戀花

這一闋充滿了故國情懷的「蝶戀花」詞是我國旅美學人蕭公權教授的作品。寄寓北美三十年，蕭先生所寫的作品不少是尼采所謂的以「血」和「淚」凝聚而成的詩篇。三十年前，大陸淪陷，神州陸沈，在這一個時代的大變局中許多我國學人浪跡異邦，設講於歐美各大學，傳授中國學問。這種情況與論語微子篇記載春秋時代魯國衰微，禮崩樂壞，樂師散而之四方的情形：「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海。」雖時隔事異，但仍有幾分近似之處。這從一方面來講，固然中國文化的光芒賴此而得以廣被歐美，引起世界學壇的重視；但從學者個人立場來講，則「落花自造飄零業」（引蕭先生「桂枝香」詞），寄

元坐

乙卯小寒後
四日作

敲窓夜雨幻秋聲
兀坐寒齋客
思榮故國艱難千里夢長宵
五十年一覺
一燈如知安樂車成新鬼殘歲年端
却別情結伴還
却天僅許些時休矣
卜他生

蹤萬里，終不免有「爲人作嫁」之感。他們身在海外，心繫祖國，尤其關心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他們維護中國文化的心意和他們的故園情懷一樣地刻骨銘心。「萬里寄蹤長是客」，蕭先生十餘年前從華盛頓大學退休時所寫的詩句最能透露這些流寓異邦的前輩學人的心情。

去國離羣，這些我國學者在異邦如何作學問？如何播種中國文化的種子？他們對明日中國文化懷抱怎樣的想法和期望？這些都是海內外關心中國文化前途的人所關心的問題。在「蕭公權先生全集」（聯經出版公司排印中）及蕭先生手稿「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臺灣學生書局排印中）出版前夕，筆者獲緣趨訪先生，侍談多次，本文即根據訪談筆記以及蕭先生著作整理而成。篇中於記錄訪談內容之外並略述筆者對蕭先生身世和品性的認識。

一、舊學與新知的融會

蕭公權先生是江西省泰和縣人，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公元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原名篤平，號述園，今年八十三歲。蕭先生生長在近代中國激變的歲月裏，「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守舊」與「維新」各種勢力的相激相盪都隨着西潮東漸而日亟一日，舊學與新潮在這種激盪的過程中由衝突而走向調容。蕭先生畢生的成學經過、學術歷程、乃至人生哲學莫不處處顯露出這種時代背景的投影。

蕭先生幼年啓蒙以後所接受的是私塾教育，由此奠定了舊學的基礎，中學畢業以後入清華學

校（國立清華大學的前身）肄業。民國九年夏初清華畢業以後，問學新大陸，先入密蘇里大學，獲學士及碩士學位，繼於民國十二年入康乃爾大學哲學系，受業於狄理（Frank Thilly）教授門下。民國十五年六月，以「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論文獲博士學位。蕭先生這篇論文完成以後即一字不易在英國出版，並經英國牛津大學指定為「近代名著」課程之必讀書籍。此書係站在唯心論之立場批判歐洲當代政治學大師拉斯基（Harold J. Laski）的政治多元論，這是蕭先生的第一部著作，出版以來，佳評如湧，拉斯基本人亦著文備加推崇。民國十五年，蕭先生回到國內，開始了他四十二年的教學生涯，曾先後任教於國內的民國、南方、南開、東北、燕京、清華、北京、四川、光華、華西、政治各大學，民國三十七年在臺灣大學任教一年，民國三十八年起移講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至民國五十七年退休為止，共在華大任教十九年。蕭先生的求學時代橫跨新舊兩個時代，所以他既能浸潤在中國舊學的傳統裏，又能吸收西方學問的新知，以開展視野廣闊的學術領域，所謂：「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用來形容蕭先生的學問可說是最恰當不過了。

最足以透露出蕭先生對舊學與新知的融合的莫過於蕭先生所發表的著作。蕭先生的第一部著作「政治多元論」是批判歐洲當代政治理論的力作。他回國任教以後，則著手整理中國政治思想，於是有了「中國政治思想史資料選讀」（民國二十六年國立清華大學講義）以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四年）的出版，「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最近並已由牟復

禮 (F. W. Mote) 譯成英文：*A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vol I,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民國三十七年，蕭先生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民國三十八年蕭先生任教華大以後，著手研究十九世紀的中國鄉村，完成了「中國鄉村」(*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這部巨著，最近出版的新著則為「康有為研究」(*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民國四十九年，「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以「人文學術卓著成就獎金」頒予蕭先生。該會在獎狀中推崇蕭先生「融合中西兩個偉大學術傳統的菁華」，並讚頌他早年評論西洋政治思想的著作表現了「創造性的灼見」，論述中國政治思想史則顯示了「自開蹊徑的史識」。這種讚頌絕不是溢美之辭，而是對蕭先生的學問極其恰當的說明。這種創造性的見解與自開蹊徑的眼光主要是來自於蕭先生治學能在中西新舊各種學問之間獲致一個動態的平衡點。如果我們把蕭先生的治學放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背景裏來看，那麼我們更會覺得他在中西新舊學問之間取得妥洽的平衡點是多麼的可貴。近百年來中國學術與世變相推移，西方文化隨着帝國主義勢力的擴張而強烈地衝擊着中國文化的海岸。處在這種激變歲月中的中國知識份子極不容易在中西新舊之間保持理性的平衡。所以，五四以來的學術界，一方面打倒孔家店的呼聲甚囂塵上，但另一方面痛斥西方文化為洪水猛獸者亦不乏其人，而許多留洋學生或成為西方學壇的逐臭之夫，或隨波逐流，忘却故我，形成蕭先生早年所寫的詩中所謂「邯鄲學步事堪傷」的

局面。在這樣的歷史背景裏，蕭先生以批判的態度吸收西方學問，而以理性的立場反省並發揚中國傳統，就顯得特別值得我們景仰。

正是基於這種批判的與理性的治學立場，所以蕭先生鼓勵學生以開放的心胸對待不同的文化傳統，而以客觀的態度從事著述。數年前，蕭先生寫一幅中堂送給他的學生普林斯頓大學牟復禮教授云：「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此荀卿子之名言也。余往歲竊取其意而爲治學之座右銘曰以學心讀以平心取以公心述。」這正是蕭先生平素教導學生一貫的宗旨。

那麼，在今日中西接觸頻繁的世局下，研習文史的人應特別留心什麼？對於這個問題，蕭先生說：「從前的人可以只講國學，但現在我們應敞開心胸，講諸國之學，除了我國古典之外，在西洋學問中應當從閱讀西洋諸大家的經典作品入手。例如柏拉圖、康德的著作對我們思考問題都有很大的幫助。」蕭先生談起他求學時代的康乃爾大學哲學系是當時唯心論的一個重鎮，他求學期間曾精讀康德的哲學論著，雖然後來並沒有走上純哲學研究的道路，但是那幾年哲學思考上的訓練對以後的治學却有莫大的幫助。

蕭先生雖然強調哲學思考訓練的重要，但是他最反對時下學界亂套「概念」，天馬行空地亂用「理論」的浮誇風氣。他常以「平正踏實」四字勉勵學生，鼓勵學生從資料上建立理論，不要先有理論才去找資料來填補。所以，蕭先生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推崇備至，認爲是通過史料建立理論的典範，而對維特孚哥（K. A. Wittfogel）的「水利社會說」則斥之爲架空而經不起史料

印證的無根之談。也因為這種踏實的性格，所以蕭先生治思想史極注意思想的歷史背景，認為研究思想史不可以把一個思想體系或一個觀念完全孤立於它所從出的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文化背景來觀察。就這一點來說，蕭先生所持的立場顯然與文化有機論者相當接近。

二、中國文化的研究及其他

華盛頓大學歷史系主任屈萊果 (Donald W. Treadgold) 教授在他所著的「俄國與中國史上的西方」一書的序言裏，曾舉出蕭先生與夏濟安先生二人，推許為他所熟知的當代中國學人中嫰熟西方文化傳統並能作適度調和的「折中主義者」。這自然是十分正確的說法。蕭先生精通中、英、日、法、德文以及拉丁文，對中西學問皆極深入。這樣一個文化的折中主義者對於近數十年來歐美學壇的中國文化研究成果有什麼看法與批評呢？

蕭先生在他的回憶錄「問學諫往錄」中對這個問題會作過直接的回答。他說他在美國一住幾十年，「這固然是因為工作愉快，『人緣』不差，使我不想離去。但這不是惟一的原因。近幾十年來美國若干大學先後設立了遠東語文系和研究所。中國語言文學的傳習，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往往成為致力的主要對象。師資、圖書、學生的數量陸續增加。『漢學』的重心逐漸從歐洲移到新大陸。這是可喜的現象。但過速的進展引發了一些缺漏。我不禁想就個人薄弱的能力所到，做一點補苴的工作。」他指出，歐美學人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因求速成，講實效而未能有令人十分

滿意的成果。許多年輕漢學家多半是大學陞遷制度下的犧牲品，因為他們「不願（或不能）廣參細考中文書籍，但又必須時時發表著作，以便維持或增進他們的聲譽，或博取升級加薪的待遇。天資高一點的會從涉獵過的一些資料中『斷章取義』，挑出『論題』，大作文章，只要論題新鮮，行文流暢，縱然是隨心假設，放手抓證的產品，也會有人讚賞。作者也沾沾自喜。這種作風竟有點像王陽明在『書石川卷』中所說的『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

蕭先認爲，對飄泊異國的中國學人而言，矯正西方學壇的「中國研究」的缺失與偏差是一項責無旁貸的重大責任。他自己數十年來所發表的論著也確實當起了這項責任。例如：一九六〇年「中國鄉村」一書問世，使此後中外學人論述近代中國鄉村社會有了信實詳瞻的根據，史堅雅（William Skinner）論中國鄉村的市場結構即多本蕭先生之說。今年年初「中國政治思想史」英譯本出版，立即成爲各大學研習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必要書籍，數月內即銷售一空，現正籌劃第二次印刷。美國學者如高慕軒（Michael Caster）、牟復禮等人論中國思想尤其深受蕭先生的影響。

從歐美學壇的「中國研究」，我們的話題轉移到近年來許多人感到興趣的一個問題：傳統中國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與近代西方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的調容的問題。蕭先生說：「談到這個問題，有兩點值得我們先作考慮：第一，我們不能以人爲的力量刻意去調容兩種思想。事實

上，兩種具有活力的思想體系碰在一起自然而然就會由接觸而走向瞭解調容的路。第二，我們要檢討一下：儒家思想是指什麼？從中國歷史來看，儒家思想可分為兩派：一是先秦時代的儒家思想；一是漢代以後歷代帝王所尊崇的儒家思想。康有為曾說過，專制帝王利用儒思想來作為統治的工具。西方學者稱這種被利用的儒家思想為 Imperial Confucianism。我們詳讀論語和孟子就知道孔孟絕不主張君主有絕對的權威。孔子主張對人恭敬，對君主恭敬，「執圭，鞠躬如也」（鄉黨篇），但絕無專制思想。孔子所提倡的毋寧是一種普遍的作人的態度。至於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則幾乎和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相接近了。中國古代雖無“Government by the people”的事實，但是“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Government of the people”的想法仍是有。孟子「國人皆曰可殺」的講法更與西方議會政治的精神相當接近了。因此，先秦儒家孔孟的思想與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是接近的，自然能够調容。」

蕭先生上述的看法和他幾十年前寫「孔子政治學說的現代意義」（刊於民主評論一卷六期）時的意見是前後一貫的，他說：「孔子的全部政治學說，從根本到枝節，都以『人』為其最高、最後和最直接的對象或目的。在他的學說當中，政治生活是人性的表現，是人性發展的過程，是人類活動的結果，是滿足人類要求的努力。我們儘可套用美國故總統林肯的名言，把孔子的學說稱作『人治、人享、人有』的政治觀。因為孔子的理想託基於人的本身，所以他絕無追玄虛理想而犧牲人類實際利益的錯誤。」蕭先生認為二千年來國史上的專制史實正是孔孟思想未能落實到

現實層面所造成的結果。因此，他認為此後只要大家真正接受孔孟哲學並身體力行，民主政治的實現是可能的事。

何以原始儒家思想與西方民主政治精神相近？蕭先生以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原始儒家主張性善說。他說：「西洋的自由民主思想的基本假定是人性本善，盧梭說：*Men are born free*，這可視為一種性善說。盧梭是哲學上的浪漫主義者，孟子也是浪漫主義者，孟子也主張性善。性善論者均主張人人可以自主、自治，因此人有天賦人權。所以，持性善論的思想家傾向於民主政治而持性惡論的人則多傾向於專制。」

儒學傳統源遠流長，方面亦廣，就未來中國的發展而言，儒學的那一個方面特別值得我們注意保存並發揚？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蕭先生指出，儒學的基本關懷在於道德，知識只是達到道德的一個工具而已。這一點從先秦儒家一直到宋明儒都是如此看法。他說：「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求善的文化，而不是一個求智的文化。古希臘人追求真、善、美，在中國文化裏佔第一位的是善，其次是真，極少注意求美。道德是目的，知識是手段。孔子所提出的關於修身的道德原則仍是適合中國現代化的需要的。比如說，儒家所說的『敬』就是把人當人看待，把一樁事當一樁事辦，尊重他人，敬事而信，民主主義的精神亦不過如此。」

三、多元的文化觀與中庸的人生觀

蕭先生對原始儒家思想推崇備至，但他絕不是一個文化的一元論者。相反地，他對不同的文化傳統都予以尊重，平等對待。這種多元的文化觀與他成學過程中對中西學問的融會是很有關係的。他說：「我認識西洋文化的優點，却不鄙視中國的固有文化，以爲毫無價值，必須悉與拋棄。『全盤西化』的主張者對於中西文化未能充分了解。他們的主張是錯誤的。我相信中國文化和西洋文化都有優點和缺點。我們要用虛心的批評態度同時去檢討中西文化。」

在執教於清華大學的時期中日戰爭爆發，蕭先生全家從清華園遷居北平城內與哲學大師熊十力先生住在同一所房屋裏，與熊先生朝夕見面，談論問題。蕭先生回憶說，有一次熊先生堅定地說：「西洋哲學與科學都缺乏妙義，沒有研討價值。」蕭先生站在欣賞不同文化的優點的立場說：「印度哲學與西洋哲學價值如何，有待兼通兩者而具有『善知』的人來作公允正確的估量。照我外行人的臆測，兩者各有其獨到偏至之處。東海西海，各有『聖人』。其心其理，不必盡同。但是否此尊而彼卑，此長而彼短，似未可遽下斷語。至於科學，也未必毫無足道。朱子『格物致知』的思想，顯然帶着西洋科學思想的意味。」據說熊先生雖面露不愉之色，但也未加駁斥。蕭先生的意見顯然和他所持的文化的多元觀互相呼應。

由於這種開闊的心胸，所以蕭先生對晚近歐美學人所創的「儒教國」（Confucian China）

一詞頗不能同意，認為這種說法把內容豐富的中國文化狹隘化了。他說：「『儒教國』是近年英美治中國史者習用的名詞。它雖是很方便的名詞，但不能精確地表示中國帝制時代政治的特質。帝制的形成和維繫多有賴於儒術，但得力於法家之處也不少，儒家不能獨居其功。專制政體的內在缺點多淵源於法家的影響，儒家也不能獨任其咎。」蕭先生曾以此意撰成專文，指出專制政體與法家思想有密切關係，並駁斥所謂國史上的專制政治應由儒家負其全責的說法。基於這種看法，蕭先生常說，五四諸君子操之過急，以致未能對中國文化發展作更好的貢獻。

五四時代許多激進青年以離棄媒妁之言的婚姻作為與舊傳統割裂的表徵。蕭先生在赴美留學以前早由家長主持訂婚，出國後也和許多當時的留學生一樣碰到新舊之間的抉擇，但是蕭先生仍在民國十五年回國結婚。他認為除非一個青年確知父母代擇的未來配偶有重大缺點，否則很可能不必反對。蕭先生在婚姻問題上特別稱讚胡適之先生，他認為：「『新文化』的倡導人，『終身大事』劇本的作者，替面臨二十世紀初葉過渡時期的青年們開闢了一條知新而不棄故的婚姻之路。……我也走過這樣一條路。」蕭先生對婚姻問題的看法最足以顯示出他所持的中庸的人生觀。

程子曾解釋「中」「二」字的含義說：「不偏之謂中，不倚之謂庸」。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這正是蕭先生的人生哲學，他早年對婚姻問題的處理固然顯示出中庸的人生態度，他在抗戰時期談憲政民主的基本態度也是如此。他認為「我們不可因為『民主』有缺點而加以菲薄，我們也可對『民主』求全責備而延誤其實現」，所以，他極力主張：「我們對於中國正待實施的憲政必

須求實而不可求全。」這種議論是從他凡事不偏極端的人生態度中自然引申出來的。

正因為凡事取其中庸，所以蕭先生的生活是多方面的而不是偏枯的。除了學術工作之外，他也寫詩填詞，在執教清華及川大期間常與詩人朱佩弦（自清）、吳雨僧（宓）兩先生時相酬唱，有「述園詩稿」及「畫夢詞」分別在臺港兩地刊行。這些詩詞不僅記錄了蕭先生個人一生的心路歷程與感情生活，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當代中國的苦難與亂離。蕭先生抵美以後所作詩詞尤其哀痛，充滿了對故國山河的眷戀。如「庚寅九月十五夜對月」詩云：

林風瑟瑟露溥溥，地近朔荒秋早寒。

衰病叢身仍作客，殊鄉對月強憑闌。

劫餘親友來音少，國破山河入夢難。

一片清輝還似舊，捲廉枯坐夜深看。

又如七十一歲時所填「鷓鴣天」詞曰：

困守書城四十年，苦無新解出陳編，

心慚杜庫千秋業，目斷齊州九點煙。

巢已破，卵空全，神皋洪水正滔天，

王師北定知何日，閒殺乘風萬里船。

字裏行間那種去國懷鄉滿目蕭然的情感躍然紙上，讀之令人泫然欲泣！一九七五年，蕭先生曾寫

一首詩與任教於麥迪遜威斯康辛大學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的我國學者周策縱教授唱和，此詩雖未正式公開刊印，但因感情真摯，句句血淚，極能寫出我國前輩學人那種遠託異國心繫故土的情懷，此詩在蕭先生的友生之間流傳頗廣，詩云：

兀坐

乙卯小寒後四日作

敲窗夜雨幻秋聲，兀坐寒齋客思縈，
故國艱難千里夢，長宵辛苦一燈明。
知交幾輩成新鬼，殘歲無端動別情，
結伴還鄉天儻許，此生休矣卜他生。

據說周策縱教授會將此詩抄示給任教於哈佛大學的楊聯陞教授，楊先生感動良深，曾為之流淚。

蕭先生平日家居亦以治印為樂事，他珍藏有裝訂精美的線裝小冊，顏之曰：「述園印存」，收集數十年來所刻印章，彌足珍貴。那天談話告一段落後，蕭先生引我參觀他寓所後院的花圃，其間開滿各式各樣的花，顯然是主人刻意經營的成績；前院則栽有一排修竹，迎風搖曳，極富古雅之美。我忽然想到，竹子那種韌而耐久、老而彌堅的性格不正是蕭先生一生為人治學的最佳寫照嗎？

辭別蕭先生，在暮靄蒼茫中從華大校園遠眺瑞尼爾山 (Mount Ranier) 在薄霧中若隱若現，景象極似今年年初蕭先生送我的一首詩中的境界。謹錄之作為本文的結語：

遙山明滅隱煙霞，健步探奇得趣嘉，
行過幽崖舒望眼，寒塘雪霽綻梅花。

——一九七九、八、八初稿於西雅圖一九七九、十、廿五、定稿
(本文原刊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民國六十九四月三日)